

## 書 評

《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爲：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  
丁仁傑著，台北：聯經，1999年，549頁，NT\$550（精裝）。

本書的主標題是「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爲」，副標題則是「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主、副標題的安排可以清楚地顯示，這本書主要是一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其次才是宗教社會學的作品。不過在社會心理學普遍不受重視的情況下，這本著作的宗教研究性質卻反而更爲突顯。這是這本書在此時此刻的台灣出現的一個弔詭現象。

作者在本書當中，環繞著助人行爲，以慈濟功德會爲例，從各個角度來作探討。由於這是一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因此助人行爲不是被當作個人的特色（不管是信仰的、動機的或人格的特色）的表現來予以討論，而是擺在整個台灣的歷史、社會、文化、社會網絡，以及更重要的，慈濟功德會這個團體的組織、結構、文化規範和內部的互動過程來理解。整本書從理論的探討、批判、使用，到現象的鋪陳與理論的修正都是朝這個方向進行的，因此讀者很容易可以掌握到，慈濟功德會成員具體的行爲和助人的實踐過程中，所涉及的諸多不同層次和面向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事實。作爲一個社會心理學的著作，這本書相當清楚地掌握到這一個基本的進路。

本書同時也是一個相當紮實的經驗研究作品。作者從各個角度，以各種理論（包括助人行爲、社會運動、皈依理論等）去觀察、檢證慈濟公德會成員的助人行爲。檢證過程所使用的方法和資料相當令人注目。除了所謂主流社會學所經常使用的量化統計之外，作者也大量使用了文獻分析、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方式來進行研究。資料的排比和現象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對所謂「質化」與「量化」的「區別」，乃至於「界限」，是相當不在意的，也因此這本書可以使用最多樣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來對一個議題進行深入而細緻的分析。整

體言之，這是一個相當嚴謹而又分析入裡的社會學作品。

在本書的各章中，作者都有某個程度的貢獻。從第二章中主題的選定、概念的釐清、樣本的抽取以及可能誤差的估計和矯正、多重資料來源的研究方法等都可以看出，作者顯然是一個相當嚴謹的研究者。特別在其中一節，作者詳細地討論他作為一個研究者，逐漸趨進慈濟功德會，成為其中一員，以及資料蒐集結束之後離開，進行資料分析的過程。這一節的描寫與反省相當細膩而「動人」。有興趣探討「研究者—被研究者」的關係的讀者，可以在這裏讀到相當好的經驗報導和反省。

第三章是慈濟的發展相應於台灣的社會歷史與宗教文化的介紹；第四章則是慈濟內部次級團體的參與者的描述。第三章使用了許多文獻的資料，除了扣連慈濟的發展與台灣的社會變遷之外，也處理了與「功德」這一個概念相關的倫理以及宗教的文化內涵；第四章則使用了作者自己親身參與的經驗，和慈濟人互動的經驗，以及深度訪談的資料，具體地描述了各個次級團體的成員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連結到慈濟的助人行爲之中（頁 128）」。這與一般單調的、組織表列式的介紹方式相較之下，顯得突出而又深具社會學的意義。

第五章探討成員的招募。作者在這一章中特別強調社會網絡的作用。根據研究所得，有幾近九成的受訪者是經由原有的社會網絡被吸納進來的。作者進一步分析這些網絡的特性，並認為個體在網絡中的位置，與日後個體在團體中是否扮演積極的角色有很大的關連。此外，透過與美國研究 ISKON 的比較，不僅突顯了慈濟（台灣）的特殊性，而且也具有繼續開拓相關議題的可能，如在這兩個國家中，不同性別在公／私領域中角色地位的不同意義；宗教社會學中宗教私人化的議題在這兩國中可能可以作甚麼樣不同的理解等。不過以功德會和 ISKON 比較可能有問題，後者在美國主流社會的觀點中可能更近於「旁門左道」，這兩者的社會認定極端不同。

第六章則是從社會運動的理論來檢視慈濟公德會的動員，特別是從集體行動框架的理論，來討論慈濟公德會的診斷、治療和動機這三

個框架，以及個體層次的認知框架的調整過程。分析的本身相當深入而又有見地，例如作者點出，慈濟公德會的框架特別會注意到與成員的生活經驗相互扣連，也因此更具有打動人心的效果。但 framing 譯為「框架」似乎並不太好，「動名詞」的意味完全消失。此外，文中以相當大的篇幅引用作者與一位成員對話的內容，來呈現成員的認知性調整過程。但這個例子卻也顯示，個體不僅在進行認知的調整，也包括個體生命危機的處理，因此其實更近於個體的「皈依自述」。以這個例子來說明個體的認知性調整，是否過於特殊，應值得商榷。

第七章談行為“實踐”。作者從動機理論和角色理論的討論出發，以自己實際研究的資料所得，將會員不同階段的助人行為，歸納為三大階段九小階段：從結構上的親近度與自由度（接觸、認知調整、情感連帶、引發助人實踐的重要事件）到角色的扮演（組織角色扮演、正面回饋、突破結構藩籬）而至最後階段的個人與外在角色的融合（公開見證、成員間對新行為模式的互相支持）。從這幾個階段的區分，很容易可以看出，作者把行動者置於社會互動結構來理解的基本觀點。雖然在階段的區分上，部分尚有可討論之處，如認知調整、情感連帶應不只是一開始才有的現象，但基本上這樣的架構相當清晰而又具說服力。不過本章中將 commitment 譯為「實踐」，這種譯法是否恰當？如果把文中的「實踐」改成「投入」或其他類似譯法，讀起來似乎更為貼切。

第八章原來的目的主要在分析動機量表所測量到的結果，但研究過程卻峰迴路轉。作者在測量動機的過程和統計分析的結果中，都發現了一些「怪異」的現象，主要是這個以「功德」為名的團體，其成員卻又對以「積功德」為行為動機有相當程度的避諱，因此作者進一步進行對不同次級團體成員的「動機描述」的分析。透過這兩個分析的交互比對，作者發現，助人的動機在功德會中其實有「幾組不同的『文化劇本』和『組織規範』在其間交互運作著（頁313）」。以此，作者「對過去關於心理學志願參與者動機的研究提出一些嚴厲的批評（頁314）」。研究的發現雖然不令人訝異，對心理學動機研究的批

判其實也不離社會學的基本態度，但作為一個解惑和探討的過程則頗引人興味；另一方面也可以增益結論以及社會學觀點的說服力。

第九章談的是助人規範的「制度化」。慈濟功德會的制度化不是一個新的發現，但此處談的是助人的規範的制度化，在此作者特別處理助人行為的「迴減效應」如何被防止的機制。這一點的提出和分析，無疑是對功德會的持續與發展的內部細節，作了切要而又深入的掌握。除了過往從奇理斯瑪的路徑化觀點來談往後慈濟功德會可能面臨的問題之外，這一章的處理無疑可以提供讀者更多具體的材料和新的思考方向。

本書的書寫大致不錯，但有時候顯得零碎。旁及的事件、個人的經驗、相關概念和討論都可能在讀者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從文中躍出；此外作者隨時注意到自己的邏輯可能產生的問題，因此當下開始進行與讀者的假設性對話，並嘗試予以提出答案。就正面來看，這種書寫方式正顯示作者處理問題的嚴謹態度；但其負面的效果則是有時會讓人覺得無端牽引，並可能有論證過程發散而不能集中的問題。

本書對過去（社會）心理學研究之批判主軸，是對助人的動機與行為之研究必須要落實在一定的社會、文化和組織結構的脈絡中，才能充分掌握其內涵。基本上這個觀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面，慈濟功德會作為一個研究「個案」，其實卻更像是一個「特例」。它是一個宗教團體而幾乎全然以「助人」為其核心信仰；它同時也具有某些新興宗教的明顯特性，如奇理斯瑪型的領袖、成員間相當緊密的互動和組織、成員間分享相當一致而清楚的共同語言等。簡言之，功德會不僅只是一個助人的團體而已，它“更”是一個「以助人為基調」的「新興」「宗教團體」，因此功德會助人行為的社會脈絡，與其他研究對象中的團體或個體所在的脈絡其實是有質的差異的。

與這一點相關的是，讀完本書後，總覺得少了些甚麼。問題可能出在於作者的理論和分析架構，有意無意地降低了這是一個創始者仍在持續運用其深刻的影響力，激發成員產生出助人行為的團體的事實。本書既然那麼強調助人行為的社會文化和組織結構的脈絡，沒有

證嚴法師這個「領袖」，這個宗教團體的文化和結構的產生、維繫與擴展，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不知作者是否有意避掉這個被台灣社會和社會心理學界已經「談膩」的話題？但避開這個主題，對本研究是有傷害的。「領袖」這個概念在本書中，至少值得有一個專節，乃至於一個專章去處理，否則對慈濟功德會助人行為「脈絡」的掌握是有所缺憾的。

郭文般

台北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方孝謙著，台北：巨流，2001年，200頁，NT\$240（平裝）。

無論戰後到 1980 年代中期仍佔社會優勢的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或是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在本地逐漸發展的台灣民族主義，它們對於日據時期歷史和當時台灣人民與殖民者的關係，都各有不同的描述與解釋。這些不同的歷史再現，卻共同反映了民族主義對歷史上「我群」成員的集體認同，採取的往往是一種相當「總體化」（totalized）的理解方式，亦即假設人們某種單一的經驗範疇——屬於一個特定的民族——會片面地凌駕、決定他們之間其它差異（譬如階級、性別、世代、職業、地區等）的影響，而成爲這些歷史上我群成員集體行動最重要的動力。

相對於至今爲止上述佔社會優勢的（不同的）民族主義的理解方式，方孝謙博士這本書最主要的貢獻，就在於告訴讀者，台灣「日據下漢人認同的問題，不應該被簡化爲『民族認同』的問題」（頁 17）。不過作者的討論，並未限於與現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相關的集體認同議題，而是較廣泛地分析在面對日本殖民統治